



第六章
嘔心瀝血
獻身國家和平統一

一九二四年前後年

TIEG20



孫中山傳

宋文翰題

「永絕反革命的根株」

一、國共合作後的勝利鬥爭

國民黨的改組，國共合作的建立，不僅推動了國民黨的革命化，而且為中共公開組織領導農運動創造了條件，促進了全國各地農組織和革命群眾運動的迅速發展，促進了全國革命形勢的高漲，中國革命運動隨之出現嶄新的局面。

在孫中山的領導下，國民黨工人部和廣州革命政府發佈了一些有利於開展工人運動，建立工人組織的法令。在扶助農工的政策指導下，一九二四年五月上旬，召開了廣州工人代表會，會上通過十二個決議，成立了廣州工人代表會執行委員會。七月十五日，中國共產黨領導沙面工人舉行大罷工，參加罷工的工人達數千人，此次工人罷工完全是政治性的，是由於英、法帝國主義不許中國工人自由出入沙面租界的所謂新警律而引起的。工人罷工後，中國籍的巡捕也罷了崗。罷工堅持一個多月，迫使英、法帝國主義取消了新警律，罷工取得了勝利，打擊了帝國主義在中國橫行霸道的囂張氣焰。這個勝利，鼓舞了全國工人階級的鬥志，推動了各地工人運動的進展。到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也就是「二七慘案」兩周年紀念日，在鄭

州召開了全國鐵路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有十二路的代表共四十五人參加，響亮地提出工人階級參加國民革命、參加國民會議運動等口號，恢復了被封閉的京漢鐵路總工會。三月一日，各地工會派代表參加了國共合作後在北京召開的國民會議促成會。

沙面和鄭州工人運動的高潮，促進了上海、唐山、杭州、武漢、北京、淮南、青島、廣東等地工人運動的高漲。

在工人運動迅速發展的同時，農民運動也積極開展起來。在國民黨改組後短短的一年裡，國民黨農民部在共產黨員林伯渠主持下，派出彭湃、阮嘯仙等人於一九二四年七月在廣州創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培訓農民運動的骨幹力量，很快在廣東省有二十二個縣成立了農會組織，有組織的農民多達二十一萬人以上。繼沙面事件成立廣州工團軍後，廣州郊區農民也組織起自衛軍。其他各縣也有農民自衛武裝的出現。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廣東省召開了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成立了省農民協會。其他各縣也有農民自衛武裝的出現。

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蓬勃發展，進一步推動了孫中山的進步。他從國共合作後革命力量的顯著增長上，更加堅定地認識到工農是革命的基礎，堅定地實行扶助農工政策。一九二四年「五一」勞動節時，他在廣州工人代表大會和廣州工人慶祝國際勞動節大會上說：中國工人「要擔任提高國家地位的責任」，「做全國人民的指導，做國民的先鋒，在最前線的陣地上去奮鬥」。¹同年七

1 《孫中山全集》第十卷，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第一百四十九頁。

月二十八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農民部召集廣州近郊農民一千余人和軍界代表共兩千餘人在廣東大學禮堂舉行農民聯歡會，孫中山出席了這次盛會併發表演說。當孫中山看到許多農民穿著破舊衣服，攜帶籬筐和扁擔，打著赤腳來到會場，深受感動地對宋慶齡說：「這是革命成功的起點。」孫中山對農民說：「本黨今日開這個農民聯歡會的目的，就是在提醒你們農民，要你們回鄉之後更提醒大眾，大眾都聯絡起來，結成團結」，「大家去奮鬥。大家能夠奮鬥，就可以成大功！」八月二十二日，孫中山又出席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辦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第一屆學生畢業典禮，並發表講話。他號召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員積極宣傳、發動農民參加國民革命的鬥爭，說：「農民是我們中國人民之中大多數，如果農民不來參加革命，就是我們革命沒有基礎。」²

國共合作與工農群眾運動的高漲，使孫中山增強了信心和力量，加上他提高了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深刻認識，一改過去對中外反動勢力的幻想和妥協。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孫中山領導的廣東革命政府就扣留了帝國主義把持的粵海關「關餘」³，並要求收回海關權益。他不顧北京外交使團要採取強硬手段的威脅和帝國主義各國派軍艦集中黃埔施加壓力，堅決予以回擊。他命令廣州政府外交部復照北京外交使團並駁斥其謬論，指出：「『關餘』完全是

2 《孫中山全集》第十卷，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第五百五十五頁。

3 關稅餘款。指帝國主義控制中國海關，在將大部分關稅收入截留為抵付賠款後，才分給中國當局的剩餘部分。

中國內政問題，無與列強之事」，⁴頁。嚴厲譴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同時，一再通令擔任稅務司的帝國主義者：如違令不交「關餘」，即行另委稅吏接替其工作。在廣大群眾的支持下，孫中山取得「關餘事件」的重大勝利。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帝國主義各國駐北京的外交使團終於被迫同意，將粵海關的「關餘」一千萬元撥交廣東革命政府。

同是「關餘」問題，孫中山的態度與一九二〇年時相比，明顯的果敢、堅定，鬥爭的結局也大不相同。這是與孫中山在這一時期革命思想所經歷的重要發展直接聯繫在一起的，也是和華南政治局勢的變化密切相關的。一九二〇年，孫中山在領導第二次護法運動時所依靠的力量，主要是陳炯明的粵軍，與人民群眾還相當疏遠。而他的收回關餘的要求，並沒有得到居心叵測的陳炯明的支援，終於不敵帝國主義的武力恫嚇而告失敗。而一九二三年的情景就大不一樣。這時，孫中山已決定採取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方針，並且得到人民群眾和中俄兩國共產黨人的有力支持，成為他的堅強後盾，終於取得了鬥爭的勝利。

在工農運動空前高漲的形勢下，孫中山決定先討伐盤踞在廣東省東江一帶的陳炯明叛軍，鞏固國民黨廣東革命根據地，然後再揮師北伐，消滅曹錕、吳佩孚直系軍閥。一九二四年九月，孫中山在廣州召開北伐第五次軍務會議，決定國民黨所能指揮的滇、桂、湘、豫、山、陝各軍於兩周內一律出師北伐。這時，孫中山親臨部隊檢閱，鼓舞士氣，發表講演，勉勵全體官

4 《關於海關問題之宣言》（一九二三年十二月），胡漢民編：《總理全集》第二集，上海民智書局一九三〇年版，第三十七頁。

兵成為一支堅強的革命軍，要「為三民主義去犧牲，不要為金錢去犧牲」，肩負起救國救民的重任。此時，有人建議孫中山寬恕陳炯明，允許他悔過自新，出師北伐，將功補過。孫中山採納這個建議，於九月十三日以大元帥名義，令東江叛軍陳炯明悔悟自新。汪精衛執意規勸陳逆歸來。於是，他派其妻陳璧君赴滬請吳稚暉出面從中斡旋，說服陳炯明出兵福建一致北伐。吳稚暉對孫中山說明此意，但孫中山堅持要陳炯明寫悔過書，承認所犯罪行。吳稚暉趕赴汕頭見陳炯明，然而陳炯明執迷不悔，雖說服再三，仍為敵到底。

這時，北京政府仍由曹錕、吳佩孚所控制。一九二三年十月，曹錕賄選總統；孫中山同月通電全國，宣言討曹。曹錕就任總統後，浙江盧永祥通電宣告不承認曹錕為總統；汪精衛、姜登選帶頭以各省聯席會議代表的名義宣佈反曹通電。一些沒有參與賄選的議員和黎元洪派的政客群集廣州、上海，擬在杭州擁黎另組政府，以盧永祥為反直中心。這時，孫中山認為革命事業已經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不宜再用「護法」作號召，更不宜再擁戴黎元洪當總統，應該徹底打倒北洋軍閥。

他決定遵守先前他為推翻直系軍閥吳佩孚、曹錕的統治，與奉系軍閥張作霖、皖系軍閥段祺瑞所達成的三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日，孫中山在韶關北伐軍誓師典禮主席臺上講話的情景。

角聯盟協定，出師北伐，「與天下共討曹、吳諸賊」。

孫中山與奉系、皖系軍閥之間的三角聯盟關係，有一個發展、演變的過程。

第一次護法運動後期，桂系軍閥架空孫中山，與直系軍閥暗中聯絡，醞釀南北議和；而直系軍閥不滿於段祺瑞的排斥，企圖通過與桂系軍閥的勾結，加強與皖系抗衡的實力，並進一步打擊孫中山。段祺瑞為減輕直、桂軍閥聯合的壓力，有意與孫中山接觸。在這種情況下，受西南軍閥排擠憤然離粵的孫中山，於一九一九年秋電召革命黨人寧武到上海，指示說：「我們要分化北方軍閥，利用直系與皖系的利害衝突，聯絡段祺瑞，特別是關外實力派張作霖，三方合作聲討曹（錕）、吳（佩孚）。」他具體要求寧武利用東北籍貫的身分，「回去做張作霖的工作」。寧武領命後，北上遊說張作霖。正欲經營關內的張作霖，表示願意考慮。到了一九二一年間，孫中山逐走桂系勢力，在廣州第二次建立了革命政權，並積極準備北伐。為了對付把持北京政府的直系軍閥，孫中山也希望繼續利用北洋軍閥的內部矛盾，爭取北伐成功。國民黨「一大」前後，孫中山

中國國民黨北伐宣言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八日)

國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眾之利益。辛亥之役，推倒君主專制政體暨滿洲征服階級，本已得勝，繼手，以從事於目的之實現，復使吾黨當時能根據於國家及民眾之利益，以肅清反革命勢力，則十三年來政治根本當已確定，國民經濟、教育革革諸端當已積極進行。革命之目的固能完全達到，然不失正路，以日趨於光明，則有斷然者。

原夫反革命之發生，實繼承專制時代之思想，對內犧牲民眾利益，對外犧牲國家利益，以保持其過去時代之地位。袁于袁世凱之稱帝，張勳之復辟，馮國璋、徐世昌之廢法，曹錕（錕）、吳佩孚之竊位篡國，十三年來連綿不絕，可知其分子固有新陳代謝，而其傳統思想則始終如一。此等反革命之惡勢力，以北京為巢窟，而流毒被于各省，間有號稱為革命分子，而其根本思想初非根據於國家及民眾之利益者，則往往志搖不定，受其吸引，與之同腐，以釀成今日分崩離析之局。此其可為太息痛恨者矣！

反革命之惡勢所以存在，實由帝國主義羽翼之使然。證之民國二年之際，袁世凱欲摧殘革命黨以遂其帝制自為之欲，則有五國銀行團大借款於此時成立，以二萬萬五千元供其戰費，自是厥后，所馮國璋、徐世昌諸人，凡一度用兵于國內以權錢異己，則必有一度之大借款以資其揮霍。及乎最近曹錕、吳佩孚加兵于東南，則久懸不決之金佛郎案即決定成立。由此種種，可知十三年來之戰禍，直接受自軍閥，間接受自帝國主義，明明白白，无可疑者。

今者，浙江友軍為反抗曹錕（錕）、吳佩孚而戰，奉天亦將出于同樣之決心與行動，革命政府已下明令出師北伐，與天下共討曹錕（錕）、吳佩孚諸賊。于此有當鄭重為國民告且為友軍告者：此戰之目的不在覆天曹吳，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以持續反對革命之惡勢；換言之，此戰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蓋必如是，然後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絕，中國乃能脫離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獨立之國家也。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八日，孫中山在韶關發表《北伐宣言》。圖為《中國國民黨北伐宣言》（局部）。

仍沒有徹底放棄這種想法。

當時，孫中山對北伐是抓得很緊的。他於九月十日召開國民黨政治委員會會議，研究北伐問題。接著，又召集政務、軍事聯合會議，任命唐繼堯為副元帥，並電促唐就職，率師北伐。十八日，以中國國民黨名義發表《北伐宣言》。

在《北伐宣言》中，孫中山明確指出：

革命政府已下明令出師北向，與天下共討曹錕、吳佩孚諸賊。於此有當鄭重為國民告且為友軍告者：此戰之目的，不在覆滅曹吳，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以持續反革命之惡勢；換言之，此戰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其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⁵

九月二十日，孫中山在韶關舉行北伐誓師典禮。秋高氣爽，軍容威壯，孫中山發佈帥令道：

「民國存亡，決於此戰，其間絕無中立之地，亦絕無可以旁觀之人！凡我各省將帥，平時薄物細故，悉當棄置，集其精力，從事破賊。露布一到，即當克期會師。」⁶

5 《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第七十六頁。

6 胡去非：《孫中山先生傳》，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七年版，第一百五十三頁。

各軍隨即分兩路向湘、贛出發。之後，孫中山又到處奔走，為北伐軍籌措軍費、槍械，並勉勵各軍將士，儘早出師，指出這次北伐，是「重新籌備革命，完成過去鬥爭未了之功」。孫中山對於北洋軍閥的罪惡統治，已深惡痛絕。

二、平定廣州商團叛亂

收回「關餘」風暴過後不久，孫中山平定了商團叛亂。這是孫中山又一次堅決反帝、反軍閥的光輝業績。

從一九二四年開始，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進入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階段。在孫中山所主持的革命政府所在地——廣東，醞釀著一場大革命的风暴。這場波瀾壯闊的反帝反封建革命運動，當時還處於萌發狀態。

事出有因。它是源於孫中山在一九二三年初重返廣州第三次建立政權時期的作為，使得廣東成為當時的革命策源地，全國革命形勢隨之出現澎湃發展的高潮。廣東革命形勢的大發展，必然引起國內外一切反動勢力的不安、阻撓和破壞。作為中國民主革命的主要敵人，帝國主義——首先是英帝國主義伸出了反革命的觸角。這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因為「……廣東接近香港，差不多什麼都受英國的支配」。廣東地區的革命化，不僅意味著它對這個富饒和重要的省份喪失了控制權，同時，也威脅到了它侵略中國和亞洲的重要據點之一的香港。所以，英帝國主義積極支援竄踞東江地區的陳炯明，「從香港暗輸軍械給陳炯明，以香港為陳炯明陰

謀密探的中心地，想顛覆廣州革命政府」。同時，又加緊勾結和利用依附於它的廣東買辦階級，把他們控制的商團、商團軍變成一支反革命別動隊，以便在革命策源地的心臟——廣州策動反革命叛亂。

廣州商團，原本是廣東商人為自衛而組織的武裝，它早在一九一一年夏季便在省城廣州組織建立。後來成為了英帝國主義、國民黨右派和鄉村地主勾結在一起的一支反革命別動隊。商團軍共有十個分團，連同後備力量，約達六千人。團長陳廉伯是英國滙豐銀行廣州分行的買辦。少數商團則同豪紳充當頭目，佛山商團團長陳恭受是曾擔任過省員警廳秘書長的惡霸地主。從二十年代初（特別是陳炯明被逐出廣州後），英帝國主義便積極扶植並控制商團。原有商團多以「自衛」為名大加擴充。

他們不僅配備著長短槍，而且還置辦了機槍。他們反對孫中山制定的革命的三大政策，攻擊「聯俄」、「容共」是「赤化」，污蔑「扶助農工的政策是挑起工人和資產階級的惡感，來坐收漁人之利」。商團頭子聽命於港英政府，英帝國主義分子曾經教唆陳廉伯說：「如果你能夠運動商



一九二四年八月初，英帝國主義支持廣東商團私運大批武器到廣州。圖為反動商團團長、武器走私者陳廉伯。

團從中反對政府，我們英國便幫你組織商人政府，你陳廉伯就是中國的華盛頓。」他們還同反動軍閥狼狽為奸，「北通曹吳，東連陳炯明」。此外，他們又與國民黨右派相勾結。儘管孫中山和廖仲愷曾經對商團進行過教育和爭取，但其領導人的反動本質促使這個組織走上「與帝國主義列強軍閥相勾結，直接阻止國民革命之進行」的反革命道路。總之，這個反動武裝集團，依靠英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內部反動力量，圖謀在革命根據地廣州發動反革命軍事叛亂，顛覆還處在搖籃中的廣州革命政府。

他們擅自在廣州成立全省商團聯防總部，以陳廉伯為總長，鄧介石和陳恭受為副總長。他們還私自向香港南利洋行定購近萬支槍支和三百余萬發子彈，企圖通過欺騙手段運進廣州，發動叛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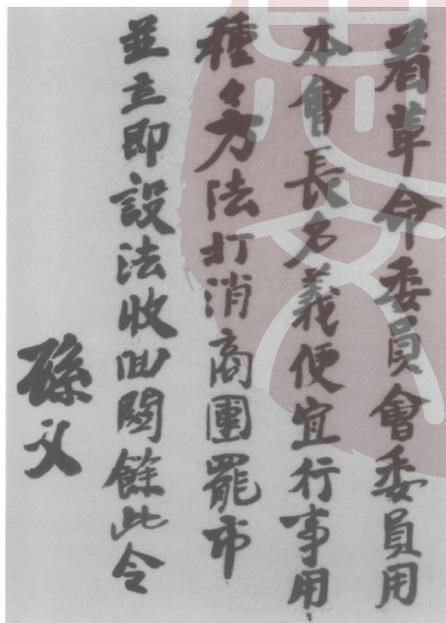
一九二四年八月十日，當偷運這批軍火的懸掛著挪威旗的丹麥商船「哈佛」號駛進廣州時，就被廣州革命政府的軍艦截獲，全部軍火被扣留，「扣械潮」就此引發。

當時，蓄意叛亂的商團，遂以此為藉口出動了兩千多名團丁包圍了孫中山的大元帥府，叫囂發還槍械，進行搗亂。他們大肆散發反動傳單，叫囂什麼「赤化亡黨」、「共產在即」，千方百計擴大事態，並一方面同軍閥和國民黨右派勾結，加緊策劃武裝暴動；一方面又煽動和脅迫商民罷市。在他們的威逼和煽惑下，廣州商人掀起罷市風潮，反對革命政府，動亂陸續蔓延到全省各城鎮一百多處。

變生肘腋的商團叛亂，對孫中山和他主持的廣州革命政府無疑是一場嚴峻的考驗。作為

革命民主派的領袖，孫中山經受了鬥爭的磨礪。在中國共產黨的積極幫助下，在廣大工農群眾和革命軍人的推動下，在國民黨左派的支持下，孫中山對商團採取了堅決的態度。雖然，他在這場尖銳複雜的鬥爭過程中曾經有過猶豫和動搖，甚至一度作出過失誤的北伐決策——這主要是國民黨右派、中派對他實行包圍和施加壓力的結果。然而，重要的是孫中山及時克服了這些消極因素，在關鍵時刻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和革命人民的主張，對商團叛亂進行了鎮壓，鞏固和發展了革命策源地，從而，為北伐戰爭根據地的鞏固做出了貢獻。

孫中山對帝國主義的走狗——商團採取了堅決態度和手段，決不是偶然的。這反映了他後期思想的深刻變化和發展，也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和廣大工農群眾、革命軍人對他的支持和促進。還在商團叛跡初露的時候，共產黨人就指出不可「姑息養奸」，「對廣東政府對待商團的優柔政策，老早就表示警告」；認為「革命政府軍事計畫，第一步是解散商團軍」。在後來的事變進程中，共產黨人多次要求孫中山排除國民黨右派的包圍和干擾，振奮大無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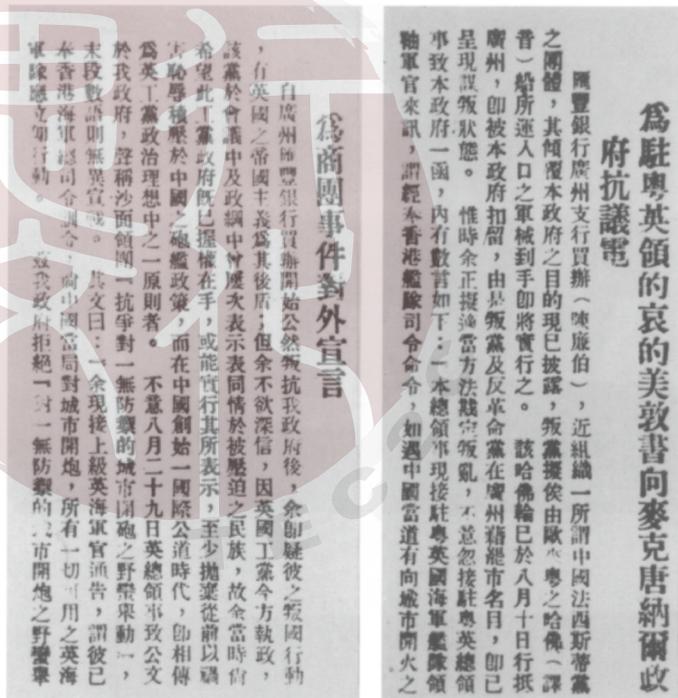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廣州商團實行罷市。次日，孫中山授權革命委員會取締商團罷市及收回「關餘」。圖為孫中山的手令。

的革命精神，對猖獗一時的商團給予迎頭痛擊！⁷廣大工農群眾對商團的倒行逆施義憤填膺，積極支持孫中山的革命行動，決心組織、武裝起來，同商團「決一死戰」！總工會在罷市開始後，立即發表《勸告商民復業書》，誠以「勿為謠言所惑」，要求「先行復業」。廣州工代會在通電中聲討了商團的累累罪行，表示「誓為政府之後盾」，要求將所扣槍械「全數沒收，撥為組織工團軍農團軍之用」。為了發動更多的工人共同向商團鬥爭，還組織了「勞工同盟救國會」。八月二十六日，工團軍首次進行編制和訓練。「人數有三百人，直接受工人部的指揮。」廣州附近各屬農會紛紛組織農民自衛軍，配合和參與了反商團鬥爭。這支同反動鄉團相抗衡的農民武裝，共有槍三千支。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員也建立了農民自衛軍，警衛廖仲愷主持的省長公署。工團軍和農民自衛軍八百餘人在二十九日向孫中山請願，要求明令討伐商團。廣州革命政府掌握和影響的四所軍官學校的二千余名學員們大都鬥志昂揚，特別是黃埔學生軍更為愛恨分明，扣械事發後，「全體學生表決將其扣留，並準備與商團作戰」。廣州的市民則組織了平糶委員會，準備接管糧店和罷市的商鋪。廣大革命群眾紛紛集會遊行，支持孫中山對商團的果決措施。八月二十六日，工農群眾還組織宣傳隊前往佛山。顯然，中國共產黨和革命群眾的積極支持，給予孫中山以力量 and 信心，促進他對國內外反動派的進攻採取反擊的態度。

7 參閱《嚮導》第七十九—九十二期和一系列相關的論文和述評。

事與願違。商團的脅迫並沒有嚇倒孫中山和廣州革命政府，反而激起了群眾鬥爭的新浪潮；陳廉伯之流的處境十分孤立，面臨著潰滅的命運。在這種形勢下，英帝國主義不得不從後臺走到前臺。狡猾的英帝國主義早已通過陳廉伯等緊密控制著商團，並在幕後操縱其活動。他們把沙面提供給陳廉伯作為罷市指揮機構的駐所，並參與了商團的一系列「秘密策劃」。然而走狗黔驢技窮，孫中山宣佈「要以武裝削平禍亂」，於是主子被迫登臺——英帝國主義採取傳統的炮艦政策，公然出面干涉中國的內政。他們在八月二十八日，派出九艘軍艦集中於白鵝潭，將炮口對準中國軍艦進行恫嚇。當天晚上，列強領事團向廣東省長廖仲愷提出「警告」和「抗議」。二十九日，英國駐廣州總領事向大元帥府發出最後通牒，竟然蠻橫地宣稱「奉香港艦隊司令之命，如遇中國當道有向城市開火時，英國海軍即以全力對待之」。⁸但是，英帝國主義的張牙舞爪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九月一日，孫中山為抗議英帝國主義支持商團叛亂發表對外宣言，尖銳地指出「二十年來，帝國主義各強國於外交上精神上及以種種借款始終一致的贊助反革命……蓋今有對我政府之公然叛抗舉動，其領袖為在華英帝國主義最有力機關之一代理人。我政府謀施對付此項叛抗舉動之惟一有力辦法，而所謂英國工黨政府者，乃作打倒我政府之恐嚇！此是何意味乎！蓋帝國主義欲毀壞之國民黨政府，乃我國中惟一努力圖保持革命精神之政府，乃惟一抗拒反革命之中心，故英國之炮欲對之而發射」。明

確表示：「從前有一時期，為努力推翻滿清；今將開始一時期，為努力推翻帝國主義之干涉中國，掃除完成革命之歷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礙。」⁹同時，對英國麥克唐納政府「干涉中國內政提出嚴重抗議」。在這期間，孫中山還在同外國記者的談話中重申：「帝國主義……不僅是我們走向獨立自由的道路上的主要障礙，而且是我國的反革命中最強有力的因素。」¹⁰孫中山義正詞嚴的聲明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尊嚴，體現了廣大人民反帝的意願，因而，也贏得了國際無產階級和世界人民的支持。在不屈的革命人民面前，英帝國主義的政治恫嚇



一九二四年九月一日，孫中山為商團事件發佈對外宣言和通電，抗議英帝國主義的干涉行為。圖為《為商團事件對外宣言》及《抗議電》（部分）。

⁹ 《孫中山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八百七十一—八百七十一頁。
¹⁰ 《廣州公報》，一九二四年九月八日。

和軍事訛詐遭到破產。

在整個商團叛亂過程中，國民黨右派充當了商團的內應。他們之間或是勾勾搭搭，或是「心有靈犀一點通」。「扣械潮」起，右派政客就反對孫中山對商團採取的果決手段，要求「和平審慎」，鼓吹「和平解決」。伍朝樞等還阻止工團軍、農民自衛軍的建立，不同意群眾革命組織或省署接管糧食貿易商店而罷市。握有兵權的右派——駐在廣州的滇系軍閥范石生、廖行超和盤踞廣州河南地區的李福林等，更直接同商團相勾結。借「調解」為名，向革命政府施加壓力。駐紮廣州地區的范石生部（第二軍）和廖行超部（第二師），則是滇軍的主力。他們盤踞河南地區的李福林部，成為廣州的軍事統治者。除警衛軍、豫軍和許崇智部外，各軍大都不聽孫中山的調遣。他們「假革命之名，以行盜賊之實」，以致「革命政府不特不能資以為用，且受其牽制，使一切革命政策無由實行」，右派軍閥在商團叛亂中的作為，完全屬於這種性質。

正在這時，成為奉系、皖系軍閥聯合反對直系軍閥大戰先聲的江浙戰爭於九月三日爆發。盧永祥在浙江發難，揭開反直戰爭的序幕。九月十七日，直奉戰爭開始。由於孫中山同皖系、奉系訂立過反直聯盟，所以決定參與討直戰爭。他發表了討伐曹吳宣言，積極出師北伐。

在當時的形勢下，孫中山的北伐決策無疑是缺乏積極因素的。顯而易見，這是右派包圍和影響的結果。「右派因為恐怕孫中山與英國帝國主義衝突而打破他們的巢穴，因為要成功與陳炯明的調和以鞏固他們與左派對抗的武裝勢力，因為要討好段、張、唐繼堯等軍閥以遂其

蠅營狗苟奔走南北升官發財的勾當。」所以，他們竭力慫恿孫中山北伐。這項決策的制定不僅是倉促的，而且具有「孤注一擲」的性質：「急撤東江防軍，不惜捨棄廣州要地。」中國共產黨當然不能贊同北伐的決策，並且對這種戰略部署作了詳盡的分析，說明不可通過北伐實現「推倒軍閥」及其「所賴以生存的帝國主義」，而只會給當前的反帝反封建鬥爭帶來嚴重的消極後果。

從北伐戰爭本身說來，這次軍事行動不可能具有鮮明的反帝反封建性質。北伐是為討直，盟友則是皖系、奉系軍閥和唐繼堯等西南軍閥。然而，直、皖、奉和西南軍閥之間的爭端，不過是為了地盤和權力的角逐，並且反映了帝國主義之間的在華矛盾。孫中山固然是為了反對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而參戰，但並沒有真正的「革命軍」作為基本力量，所以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戰爭的性質，卻在相當程度上削弱了自身的革命影響。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只能助日本帝國主義及反直軍閥張目吶喊」。至於戰爭的結果，也是可以預期的。不論何方勝利，竊踞北京政府首腦的只能是軍權在握的「武人」。辛亥革命後十餘年的政治、軍事史，已經明顯地昭示了這條規律。孫中山希望「此次一出」，「中原可為我有」，「百年治安大計，從此開始」，顯然是難以實現的幻想。可以斷言，孫中山的北伐本身是不會獲得什麼積極成果的。

需要著重指出的是：北伐加劇了廣州局勢的逆轉。孫中山在離開廣州前，向廣東人民宣告實行三項重大措施，除北伐外，其他兩項是廣東「自治」（包括廣州市長「民選」）和免除「一切苛雜捐稅」。他希望由此得以「改弦更張，以求與人民合作」。但是，三項措施並未改善廣

州的形勢。孫中山計畫「悉調各軍，實行北伐」，實際上只有警衛軍、湘軍、豫軍和朱培德部的直屬滇軍隨行。滇、桂軍和李福林部繼續盤踞廣州，擾害人民，與商團相勾結。以廣州市長「付之民選」作為「全省自治之先導」，也是沒有實際意義的。李福林和范石生、廖行超已經控制了廣州的軍政大權，「自治」、「民選」完全有名無實。歸根結底，「一切改組商團民選市長等條例便在他們手裡」。因此，「所謂以廣東還諸廣東人民便是以廣東還諸英帝國主義的走狗陳炯明及買辦階級」。至於免除「苛雜捐稅」，則是根本行不通的。儘管孫中山三令五申，廖仲愷積極「整頓財政」，但「……餉源在握的各軍長不但不能遵令取消，且更借北伐巧立名目，加抽各種捐稅。滇軍軍閥如是，粵軍、桂軍、湘軍等軍閥亦莫不如是」。九月十七日，廖仲愷被迫辭去軍需總監、財政部長和財政廳長等職。可見，孫中山離穗前的措施未能穩定、改善廣州的局勢。反之，由於孫中山「全力用於毫無結果的軍事行動上面，黨務以及在民眾間的發展完全因此停止」。

更為嚴重的問題是商團本身。北伐並未打消其反革命叛亂的謀劃。恰恰相反，這種決策所包含的回避、退讓和妥協的因素在客觀上縱容了商團頭子們。事實上，孫中山在右派、中派的包圍和影響下高估了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的力量，以為廣州「不能一刻再居」，原因有三：「英國的壓迫」；「東江敵人之反攻」；「客軍專橫，造成種種犯孽」。結論則是「宜速舍去一切，另謀生路」，而「現在之生路，則以北伐為最善」。正是在這種思想狀態下，孫中山把他認為十分棘手的商團問題交由胡漢民、汪精衛處理，因為他們「長於調和現狀」，「現

在之不生不死局面，有此二人，當易於維持」。孫中山在此期間對有關商團問題也作出一系列不明確的、乃至前後矛盾的指示——時而認為商團接受「民團條例」、報效北伐軍費後可以發還扣械，時而又命令以部分扣械武裝北伐部隊。至於留守廣州的右派和中派，對於商團更是採取縱容的政策。九月十八日，胡漢民派代表偕同商團頭子前往黃埔軍校察看扣械。二十日，政府取消了對陳廉伯等的通緝令。三十日，范石生、李福林將部分扣械從黃埔運回廣州，存放江防司令部，準備發還商團。只是在獲悉商團接濟陳炯明軍費並唆使其進攻廣州的訊息後，才暫中止。

廣州當局的這種「柔軟」態度，招致了商團的益發猖獗。九月十四日，商團散發反動傳單，叫囂「赤化亡黨」、「共產在即」，並醞釀第二次罷市。十月初，商團以扣械未還作為擴大事態的藉口。四日，全省一百八十八個商團在佛山開會，決定舉行大規模罷市和停止納稅，準備以「直捷手段」對付革命派和廣大群眾。在此前後，地主階級、買辦階級和各種反動勢力紛紛出籠，建立形形色色的組織，大造反革命聲勢。「廣東商業聯合會」通電海外，煽惑華僑反對孫中山。買辦豪紳們拼湊的「廣東省臨時大會」甚至乞憐於國聯，控告孫中山為「破壞國際善意之叛徒」。九日，商團發出了總罷市的通牒。一場反革命叛亂，已經迫在眉睫。

十月十日，中共廣東區委發動廣州的革命群眾在第一公園舉行武昌起義紀念大會。

與會者有工人、農民、革命軍人、學生和市民。會場上高懸著「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等標語。群眾團體的代表們在發言中聲討了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罪行，揭露了商團

的反革命面目，共產黨人周恩來代表民族解放協會講話，強調指出「團結起全中國的革命民眾向反革命派進攻，也就是團結起今日到會的工人、農民、兵士、學生、商人向四周圍的反革命派進攻」，就能夠實現「真正獨立。真正共和」。會後，數千群眾舉行了示威遊行。當隊伍行至太平路時，預伏的商團突然開槍掃射，前後夾擊，四面追襲，甚至凌辱被難者的屍體，殘暴地斬首剖心。革命群眾當場死傷數十人，落水失蹤者為數甚多。現場正是李福林和廖行超所部的防區，在場的福軍竟然會同商團兜捕遊行群眾。帝國主義走狗一手製造的血淋淋的慘案，就在光天化日之下發生在革命策源地的心臟！

「雙十」慘案的槍聲，立即激起了革命人民的極大義憤。中國共產黨廣州地方執委會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廣東區執委會發表《告民眾書》，號召人們進一步認清反革命勢力的猙獰面目，團結起來，徹底革命，「抗軍閥，抗帝國主義，抗一切反革命派」。並且要求國民黨「掃除向日妥協的空氣」，積極領導廣大群眾英勇奮鬥，「解除商團武裝，實行國民革命」。參加十月十日遊行的十六個團體組織了工農兵學革命大聯盟，堅決要求解散商團，嚴懲兇手。並在宣言中指出「雙十」慘案是英帝國主義、買辦階級、商團軍、陳炯明以及廣州反動軍閥製造的，號召群眾「與反革命決以最後死戰」。廣大工農群眾和革命軍人一致要求以嚴厲手段鎮壓商團。甚至小商人也起來反對商團「脅迫」罷市，要求「打倒陳逆」。

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在廣大革命群眾的推動下，孫中山面對反革命叛亂的嚴重威脅，終於下定了鎮壓商團的決心。十月十日，孫中山在給胡漢民和各軍司令的電報中指出：「商

人罷市，與敵反攻（指陳炯明部的蠢動——引者），同時並舉，叛跡顯露。」所以「萬難再事姑息」，「惟有當機立斷」，「切勿猶豫，以召自殺」。同日，孫中山成立了鎮壓商團叛亂的革命委員會，作為鎮壓反革命叛亂的權力機構，以取代廣州當局，孫中山擔任會長，以鮑羅廷為顧問，特派廖仲愷、譚平山等人為全權委員。十一日，孫中山在獲悉「雙十」慘案的消息後，當即電飭胡漢民「立即宣佈戒嚴，並將政府全權付託於革命委員會，以對付此非常之變，由其便宜行事以戡亂」。致電廣州四十餘個群眾團體，告以「已令省長、許總司令、民團統率處處長嚴行查辦」。在批示蔣介石來電中，重申對商團「嚴行查辦」。但是，孫中山當時還沒有認識到必須回師討逆，仍然以為「北伐重要，不能回省戡亂」。他指示蔣介石收束軍校，將扣械和蘇聯支援的武器運韶。

然而，廣州形勢急劇地惡化。右派和中派雖然對事態的發展也感到震動，不願意商人政府和陳炯明取代現在的廣州當局，但依舊「奔走調停」，以為「雙十」的屠殺是什麼「誤會」，公然警告革命群眾「不得藉端生事」，否則「定必按法嚴懲」。這種對策助長了商團的氣焰。他們繼續罷市，張貼「驅除孫文」、「打倒孫政府」的傳單和標語，封鎖市區，構築工事，沿街佈防，武裝巡行。十二日，商團發出最後通牒。十三日，陳廉伯指使其弟陳廉仲在沙面召集商團頭子開會，策劃擴大叛亂，決定「新老城團友一律於十四日下午五時，集中西關待命」，以便「十五日拂曉開始行動，收復省署、公安局及各財政機關」。陳廉伯則在香港策動陳炯明進攻廣州，要求英帝國主義出面干預。與此同時，陳炯明部驅使石龍土匪進窺石灘。大局的

趨勢已經十分明顯：「不出兩途：一是政府塌台，一是商團解散，絕對沒有妥協的餘地。」¹¹ 孫中山面臨著最後的抉擇——或是回師廣州，全力撲滅商團叛亂；或是放棄廣州，使煞費心血經營的革命策源地毀於一旦。形勢要求立即作出答案，容不得任何猶豫和拖延。

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是非常鮮明的，在這緊要的關頭更是主張當機立斷：「立即以少數可靠的革命軍力向一切反革命的商團和軍閥下總攻擊，以決最後的死戰。」¹² 工農群眾和工團軍、農民自衛軍鬥志昂揚。黃埔軍校學員「全體決議出發廣州作戰」，決心「與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拼一個你死我活」。國民黨左派則是一貫支持孫中山對商團採取果決手段的。正是在這種情勢下，孫中山下了極大的決心：堅決消滅反革命商團，保衛革命策源地。十二日，他命令黃埔軍校當局「立即起義殺賊，絕無反顧」；「必盡滅省中之奸兵奸商，以維持革命之地盤」。十三日，根據孫中山的手令，革命委員會飭令胡漢民解散廣州商團機關，並將商團軍繳械。同時，警衛軍及湘、粵軍各一部連夜回師廣州。十四日，再次電令胡漢民及駐廣州各軍迅速「收繳商團槍支」。十五日凌晨，商團首先向警衛軍射擊。警衛軍還擊，工團軍、農民自衛軍、黃埔學生軍以及粵、湘、桂、贛軍紛紛投入戰鬥。滇軍的范石生、廖行超部迫於形勢，也不得不向商團開火。各軍分五路將商團聚集的西關區團圍包圍起來，勒令商團繳械。商團憑藉鐵木柵欄和高樓抵抗，各軍於是分頭進攻。在工團軍、農民自衛軍和廣大人民積極支持下，疾

11 惠仙：《廣州革命派與反革命派的大激戰》，《嚮導》第八十九期。

12 伍豪：《最近二月廣州政象之概觀》，《嚮導》第九十二期。

風掃落葉，僅僅經過幾個小時的戰鬥，就以摧枯拉朽之勢一舉把耀武揚威的商團軍全部殲滅。少數流竄郊區，也未逃脫覆亡的命運。叛亂的頭子則狼狽地逃進了英國租界。

商團事件的解決，粉碎了英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顛覆陰謀，消除了廣州革命政府的心腹之患，同時，也意味著對英帝國主義和軍閥、右派的沉重打擊，顯示了廣州革命政府的決心和力量，使國民革命的主要根據地得以鞏固和發展，並為廣東地區的統一創造了條件。孫中山對此十分欣悅，更增長了對革命事業必勝的信心，從而進一步推動了國民革命運動的蓬勃發展。

三、廢除不平等條約

一八四〇年中英鴉片戰爭後，帝國主義列強通過戰爭威脅或政治訛詐，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各種名目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¹³這些數百計的不平等條約，幾如重重枷鎖，緊緊地束縛著中國，使其失去了獨立和統一。因此，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欺凌，修改或廢除奴役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以下簡稱「廢約」），成為中國走向國家統一和獨立於世界強國之林的一項重要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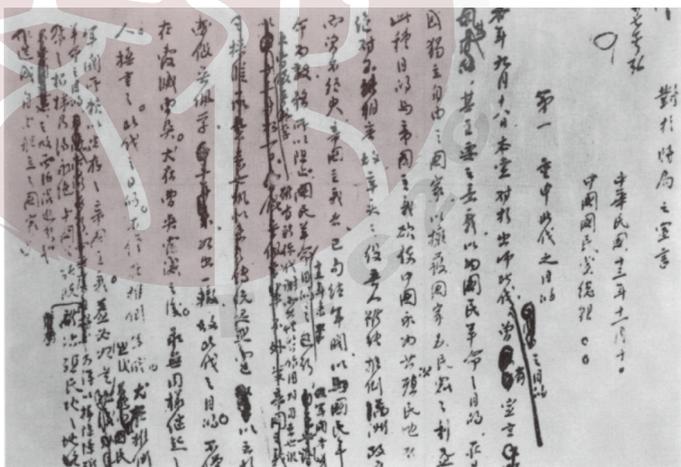
孫中山畢生為中華民族的振興和富強而奮鬥，他始終強烈反對不平等條約，並把它視為自

13 據研究者統計，一八四〇—一九四九年的二百〇九年中，中國同二十一個國家簽訂了七百四十五個不平等條約。這在世界殖民主義歷史上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怪事。參見高放：《近現代中國不平等條約透視》。

已謀求祖國獨立和統一鬥爭中一個不可或缺的活動。但是，在「廢約」問題上呈現的是一個頗為曲折、複雜和矛盾的逐漸推移過程，有著明顯的演進階段。

孫中山生活的一八六六年至一九二五年間，正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最酷烈的年代。從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中國「不敗而敗」的《中法新約》，到一九〇一年八國聯軍踐踏北京的《辛丑合約》，一個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猶如颱風所引起的割地、賠款的狂潮，將中華民族推向苦難深淵的同時也摧醒了廣大中國人民——特別是部分先進的愛國志士投身到反抗鬥爭中。

面臨著國家權益被列強分割、祖國陷於滅亡的局面，孫中山在十九世紀醞釀民族主義時，就知道中國是受著「五洲列強」各種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中國在國際上是處於「奴隸」的不平等地位。正是在這種帝國主義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屈辱和苦難、國家的貧弱和殘破的激發下，促使他走上挽救祖國危亡的道路，所以當其革命活動開始後，就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列強利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帝、反封建的主張，號召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圖為《宣言》原稿（局部）。

用不平等條約對中國進行的侵略及其危害。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孫中山在《檀香山興中會章程》中指出：「我中華受外國侵凌，已非一日」，大聲驚呼：「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¹⁴ 從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實現祖國的獨立富強為出發點，他提出了「專為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¹⁵ 而組織起革命團體興中會，以求擺脫中國在國際上處於「半獨立國」的不平等地位，從外國侵略、壓迫下解放出來。

甲午中日戰後，帝國主義侵略一步步加緊的現實，使孫中山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意識更加明確，他揭露和譴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和破壞中國革命的陰謀活動，駁斥帝國主義的侵略論調，警告帝國主義者如膽敢瓜分中國，中國人民定會「同仇敵愾」，奮起「自衛其鄉族，自保其身家」，使它們「無安枕之時」。¹⁶ 他聯絡愛國志士，「合成大團」，要立志「拯斯民於水火」，「扶大廈之將傾」。孫中山的熾熱愛國和堅決反侵略思想，為他以後「廢約」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最直接的主觀條件。

在進行革命鬥爭實踐中，隨著革命鬥爭的深入，孫中山進一步認識到不平等條約是帝國主義用以干涉中國內政、破壞中國革命的主要工具，指出：「數十年來，中國與外國所結條約，

14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第十九頁。

15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第十九頁。

16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第二百二十三頁。

皆陷於分割中國主權及利益之厄境。」¹⁷他基於對不平等條約的切膚之痛，明確地表示了對清政府與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的憤慨和批判。他說：「今有滿清政府為之鷹犬，則彼外國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攜之便」，使其能「今日簽一約割山東，明日押一約賣兩廣」，¹⁸造成了中華民族陷於任人宰割的悲慘命運。孫中山稱喻不平等條約為「賣身契」、「鐵鎖鏈」，他在探析國家民眾危機嚴重的原因時，便與不平等條約聯繫起來，認識到是各國的不平等條約使中國落到「半獨立國」、「次殖民地」的境地。因此，他將「外邦逼之」和「異種殘之」二者，並列為欲實行民族主義「殆不可須臾緩」¹⁹的內容。可以看出，孫中山甫踏上民主革命的征途，即對帝國主義列強對華侵略的危害性具有一定的認識，表示出要求國家獨立自主的願望，對不平等條約是甚為不滿，欲以去之而後快。

孫中山的「廢約」反帝思想究竟始於何時？

往昔論者多認為產生在二十年代，即一九二三年以後。從現有史料來考察，我認為孫中山在辛亥革命時期已具有「廢約」思想是符合實際的。

在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曾接連發表了一些反對不平等條約和列強在華特權的言論，他

17 《中國國民黨對中俄協定宣言》，《國父全集》第二冊，臺北近中國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第一百五十一頁。

18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第二百二十四頁。

19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第二百八十八頁。

進一步痛切地指出：「中國向來與外人所訂條約不良，喪失主權」，²⁰ 致使其「外交之棘手，系因條約」。²¹ 基於國家獨立自主的原則，孫中山提出了反對不平等條約和「除去」列強在華特權的要求，並宣稱將要求各國同意重訂海關稅則，取消治外法權，收回租界，以「得世界各邦敦平等之睦誼」。迨辛亥革命既起，孫中山對於中國國際地位的前途，懷著十分樂觀的希望。國家過去屈辱既因清廷的腐敗積弱自招其禍，則推翻清廷後一個新的中華民國自然要獨立自主於世界之林。他在辛亥年返國前，十一月二十三日，與法國東方匯理銀行總裁談話中，明確指出：要「重新掌握海關及其稅收」，實現近代中國「早想抹掉的屈辱歷史」。²² 中華民國甫告成立，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提出：務要「一洗而去」，「滿清時代辱國之舉措」。²³ 南京臨時政府外交部曾對「廢約」問題進行了研討，商議如何進行的對策。它在發佈的《中華民國對於租界應守的規則》中，針對列強根據不平等條約在中國租界內強行設立審判機關會審公堂一事，提出了要求收回管理權，以維護司法主權獨立的主張。²⁴ 一九一二年一月六日，孫中山在答覆南京《大陸報》記者問及「領事裁判權其將撤廢乎？」時，毫不猶

20 《孫中山全集》第三卷，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第十八頁。

21 《孫中山全集》第三卷，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第四十九頁。

22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第五百六十四頁。

23 《孫中山全集》第二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第二頁。

24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二輯，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十一頁。

豫地決斷指出：「自當撤廢，一俟改革既定，即須實行此事。」²⁵他已認識到中國之所以至今仍為「半獨立國」，「蓋以中國現在尚未收回領事裁判權也」²⁶，提出在「各種改革完成時，政府當立即取消領事裁判權」。²⁷他還強調要除去通商口岸、收回租界，嚴詞拒絕了外國在上海擴張租界的企圖，認為「此乃華人之意志，謂吾人必要獨立者，更不願在中國而歸洋人統轄也……洋人欲拓上海租界，惟吾人不允，此乃當然之理也」。²⁸

值得提出的是，一九二二年三月，孫中山又以「力謀國際平等」作為《同盟會總章》中政綱之一，積極的謀求擺脫中國在世界上所處的不平等地位。他還多次要求廢除侵略者在華特權和不平等條約，一再強調：「將條約修正，將治外法權收回」；²⁹「中國政府將取消各口岸（之租界）」；「吾人將取法日本。日本所有之外國人，皆受日本管轄」。³⁰

與此同時，孫中山一九二二年冬在上海與外報記者談話，一九二二年八月九日在北京與報館記者談話，同年九月二十九日在濟南與報館記者談話等，均有類似爭取國家權益的要求。

上述種種表明，孫中山在辛亥革命時期，從總體上看，對帝國主義侵略本質有了初步認

25 《孫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第一百六十頁。

26 《孫中山全集》第二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第四百九十九頁。

27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第五百九十二頁。

28 《國父全集》第二冊，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第八百〇五頁。

29 《孫中山全集》第二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第三百四十頁。

30 《孫中山全集》第二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第三百六十八頁。

識，對修改、廢除不平等條約問題是作了考慮，打算俟革命成功之後進行「廢約」之事。當時，儘管他尚未明確提出「廢約」這一概念，但是他萌發了除掉不平等條約的初步設想，並提出了一些收回國家權益的具體主張，冀求逐步砸碎列強套在中國人民脖子上的「鐵鎖鏈」。這雖然只能說是孫中山「廢約」思想的萌芽階段，卻已明確地顯示出他的「廢約」思想初露端倪，從而為後來提出成熟的「廢約」主張奠定了思想基礎。

後來，在二十世紀初，隨著民族危機的更加深重，孫中山對於不平等條約的危害認識日漸深刻，處處表現出切膚之痛，政治態度日趨明朗。照常理推論，他在南京登上中華民國的舞臺後，本應為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帶來希望，有所作為。但是，當時政局極不穩定，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列強都未承認中華民國，在清帝退位後它們也仍只承認與袁世凱發生事實上的外交關係，孫中山所預期的借款和取消不平等條約的談判，自然無法進行，客觀形勢使他也無暇顧及「改約」和「廢約」的設想。

不僅如此，當時孫中山不但未能提出反帝「廢約」口號，卻反其道而行之，出現言行差距甚大，認識與行動相互矛盾的情況。

一九二二年一月五日，孫中山在發表的《對外宣言書》中公開聲明：革命前清政府與各國「締結之條約」、「所借之外債及所承認之賠款」、「讓與各國國家或各國個人種種之權利」，「民

國均認為有效」，「亦照舊尊重之」，並「承認償還之責，不變更其條件」。³¹實際上，早在《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中，他便明確宣佈：「所有中國前此與各國締結的條約，皆繼續有效」；「所有外人之既得權利，一體保護」。³²迨辛亥革命爆發後，又通過《通告全國書》等方式，表示：「滿政府於我軍起事以前與各國所有之條約，皆作為有效」；「所借外債，一概承認償還」；「各國租界，一律保全……」³³在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後，他不過是重申前義而已。

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後，在不平等條約問題上，思想仍是矛盾的，具有兩面性。一九一二年五月，他曾提出取消各通商口岸的租界，這自然是中國主權獨立完整的合理性要求。然而，六月他在提出廢除通商口岸制度時，又表示願以「開放中國各方」來作為代價實現這一要求。他說：廢除通商口岸制度，「此乃華人之志意，謂吾人必要獨立者，更不願在中國而歸洋人統轄也。然吾人將必開放中國各方，以為酬償」。並說：「此事非欲即行，吾人將必先行自立妥善，使歐洲諸國滿意，然後請其裁去口岸。」³⁴這裡，雖僅只涉及不平等條約的一個局部問題，孫中山的態度也是軟弱無力，毫無顯示出堅強的原則立場。與此同時，在公開的宣言和講演中，再也見不到孫中山反帝「廢約」的激烈文字，而代之的是妥協退讓的言論了。

3 1 《孫中山全集》第二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第十頁。

3 2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第三百一十一—三百一十一頁。

3 3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第五百四十五頁。

3 4 《孫中山全集》第二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第三百八十九頁。

對於孫中山出現的這種倉皇反復、認識與行動相互矛盾的現象應該怎樣理解？

過去，許多論者指出是由於孫中山對帝國主義本質缺乏認識，以及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所使然。毋庸諱言，孫中山承認不平等條約，固然包含有他的妥協軟弱和對帝國主義的幻想，但僅此籠統的解釋，既不夠全面，也難以對事實的原委闡釋清楚。我認為，若將這一矛盾變化過程，置於具體的歷史背景上進行考察，對辨析孫中山的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及其真正動機是有幫助的。

參閱孫中山一生的革命奮鬥史，可以看出：他在相當長時間的革命活動中，一直沒有將主要精力放在發動和組織國內人民的鬥爭上，同時也找不到怎樣才能把廣大人民群眾喚醒並組織起來的方法，而是過於重視列強諸國對待中國革命的態度。所以，從他革命活動一開始起，就不斷想方設法地尋求和爭取外國朋友和組織的支援及援助，並且得到過日、英、美等國進步勢力和人士的較大援助，但他不能把這些進步勢力同這些國家的反動的帝國主義政府及其實行的反動政策區別開來，甚至對待後者還寄予著種種不切實際的幻想，期盼憑藉帝國主義的支援和諒解來取得革命的勝利和民國的建立，來完成自己拯救祖國的重任。而事實上，在辛亥革命時期，革命與反革命力量極為懸殊，特別是對待帝國主義列強，革命勢力根本不能與之抗衡，處於弱者的地位。因此，孫中山不能不擔憂列強對中國革命的干涉，同時又不能不幻想外援，以及爭取各國的支持和承認。特別是民國初年的政局，是特殊複雜和極端不穩定，亟須千方百計地去謀求自立。在這一歷史的具體情況下，孫中山面對現實，思緒紛繁，既要「維持國體」，保護祖國的領土完整，又

要使「艱難頓挫」的革命能夠成功，如此雙管齊下顯然力所不逮，難以兼顧。在這種形勢下，他認為，只有先清內自立，再圖禦外「廢約」，待「內治一定，則以一中華亦足以衡天下矣」。³⁵所以，孫中山權衡利弊，便作出了先自立再「廢約」的抉擇，而使用克制的態度，在制定政策時採取了應變政策和措施。他企圖在「各種改革完成時」，「俟大局底定」，再著手「廢約」的計畫。因此，他不敢與帝國主義列強公開抗爭，不僅沒有在收復主權方面採取積極行動，而且也不敢明確提出「廢約」口號，以避免引起帝國主義列強的敵意。

當時，南京臨時政府外交部在商議「廢約」問題時的態度，可以從一個方面佐證孫中山採用妥協措施的緣由。外交部官員們指出：「查自海禁開後，始與各國互訂條約，……各種失敗，日久變成例案，言之殊可痛心。新政府興，自當亟圖挽救。」³⁶但又認為，新政府剛成立，各國沒有承認，它們通過不平等條約奪取的權利「我們倘宣佈取消，它就完全幫助清方，我恐怕就站不住了」。並明智地認識到：「對於廢約或修正，總須國家完全統一，國內有相當辦法。」所以，只有打倒清廷建立統一政府後，「合力建設，再謀對外」。當前「對於各國外交，不得不容忍遷就」。³⁷

當然，孫中山用承認不平等條約及列強既得權利的妥協，以求達到自立目的的行為，與他

35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第一百八十二頁。

36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二輯，第九十頁。

37 杜春和等編：《北洋軍閥史料選輯》上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一百四十六頁。

自己倡言的維護祖國的領土、主權完整和「維持國體」的願望相去甚遠，它既偏離了拯救祖國的偉大奮鬥目標，也同當時中國人民從帝國主義枷鎖下迅速解放出來的迫切願望相悖，不利於調動而且可能挫傷人民的積極性。但是，這種具有明顯的策略意義的妥協和退讓，是孫中山在沒有找到可靠支援力量情況下所產生的一些迷誤、幻想和不適當的策略運用，是受當時歷史條件所制約的。眾所周知，歷史發展本身就充滿著矛盾，經常呈現著多樣性和複雜性，而人本來也是複雜和矛盾的，甚至在某些問題上一人一身同時就包含著互相排斥的對立面，因而人們當處於客觀形勢複雜多變之時，他們的思想行動一時間出現了複雜多變——特別是內心世界十分豐富、感情十分敏銳、閱歷不凡的孫中山，在思想上呈現出多元性和矛盾性也就不足為奇了。依據具體的歷史背景，闡明矛盾變化的原委及其內心世界，是可以理解的。

實際上，孫中山的這種妥協和退讓，也是有條件、有限度的。他宣佈承認不平等條約，是以列強放棄支持清廷、不干涉中國革命為前提的。同盟會《對外宣言》中聲明：「所有清政府與各國所立條約、所許各國權利與各國所借外債，其事件成立於此宣言之後者軍政府概不承認。」³⁸一九〇八年孫中山發動雲南河口起義，革命軍向各國發表宣言，表示承認已有的條約，但同時聲明：「外國人若有援助清政府妨害革命軍者，革命軍即將其認作敵國。」³⁹起義爆發後，以孫中山名義發佈的《通告各國書》，在表示條約有效的同時宣佈清政府於革命軍起

38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第三百一十一頁。

39 《革命文獻》六十七輯，臺北一九七四年版，第六十三頁。

義以後與各國所之條約、租界及借款，「一概永不承認」；各國如有助清政府以攻革命軍者，「即視同敵人」。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發表的《對外宣言書》中孫中山也表示了同樣的態度，申明條約「認為有效，至於條件期滿為止」，以及其他諸條「都含有不是完全承認的意旨」。從這裡可以清楚看出，孫中山雖然出於策略需要而承認了不平等條約，但他卻根據形勢發展靈活應變，既有妥協又有鬥爭，防止外人與清廷的勾結，以盡量減少對中國革命的危害。

概而言之，孫中山在辛亥革命時期的「廢約」思想和行動，在認識上具有正確與失誤並存，堅強性與軟弱性兼備的兩重性，而尤以失誤與軟弱占主導。他這樣做，儘管是出於策略上的考慮，企圖用「忍讓」、「妥協」的辦法，來作為擺脫當時困境的出路，是不得已而為之，但這一策略明顯地具有著嚴重的缺陷。孫中山自視到力量不足與列強相抗衡，但卻意識不到若宣佈代表人民心聲的「廢約」主張，將會激起多麼巨大的一股反帝力量。「妥協」、「忍讓」的結果，自然事與願違，使他的美好願望始終不能成為現實。

在辛亥革命後的十年中，孫中山經歷了一段艱難的鬥爭、苦悶和探索的坎坷旅程。他的「廢約」思想也是在曲折中向前發展的。

從「二次革命」到護法鬥爭，孫中山在承受挫折和極大痛苦中，曾不遺餘力為爭取列強的外援而多方活動。然而，對於他爭取外援的呼聲，帝國主義各國政府反應十分冷淡，孫中山得到的只是一次次的嘲弄、輕侮和吃虧上當。相反，列強還支持袁世凱篡權和極力扶持南北軍閥。正是在中外反動勢力的相互勾結、共同絞殺下，辛亥革命的果實喪失殆盡，中國出

現了軍閥割據、長期混戰的局面。隨著痛苦教訓的積多，和當時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或者說時代的變化）的助力，諸如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一九一九年中國五四愛國運動的爆發和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都給了孫中山以積極的影響。孫中山從不斷的接受新思想中，促使他的思想跟著迅速發生變化，對列強和人民的認識和態度逐漸明朗，認清了帝國主義的真面目，看到了人民群眾力量的偉大，從而對敵友我三方面力量對比的認識逐步提高，開始改變過去對列強不敢抗衡和對群眾不信任、不依靠的態度，增強了鬥爭的信心和決心。也正是在這一認識和態度逐步提高後，孫中山隨之轉變了對「廢約」的態度，最終形成和提出了自己的「廢約」主張。

早在一九一八年夏季，孫中山開始對廢除不平等條約一事提高了認識，已流露出要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意向，他曾斷然宣稱：「救國，須救到無條件收回青島及其他一切領土主權為止。」⁴⁰並於翌年初囑告參加巴黎和會的國民黨人說：在和會上「宜提出取消中國與列強所訂之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被侵掠之各地」。⁴¹同年五月的《護法宣言》中，孫中山就明確提出了要解除「一切有損主權危及國脈之條約」。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孫中山再次嚴正宣告：「對外必須使賣國條件悉行廢。」⁴²在中共黨人積極幫助和人民群眾運動的推動下，一九二三

40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四輯（上），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七頁。

41 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一九七八年版，第二百三十二頁。

42 《國父全集》第一冊，臺灣一九七三年版，第八百四十一頁。

年一月發表的《中國國民黨宣言》中，他第一次公開以宣言的形式提出「廢約」的主張，宣佈對外要「力圖改正條約，恢復我國國際上自由平等之地位」。⁴³「廢約」這一振奮人心口號的提出，標誌著孫中山對「廢約」問題認識和態度的重大轉折。

一九二四年一月，孫中山在國民黨「一大」宣言裡，以綱領形式重申堅決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認為「蓋民族主義，對於任何階級，其意義皆不外免除帝國主義之侵略」，⁴⁴在通過制定的七條《對外政策》中，主要的前五條都與「廢約」有關，明確宣佈要廢棄列強在華一切特權和不平等條約。這表明孫中山「順應時代潮流，適乎人群需要」，對帝國主義本質和對不平等條約的認識出現了歷史性的飛躍，已達到了一個光輝的高度。他的「廢約」思想作為一個完整的政治概念，至此已經正式形成。

孫中山的「廢約」活動，不僅限於言論上的一般理論批判和道義上的譴責、反對，以及積極地提出「廢約」的要求；而且，又進一步將其發展為「廢約」的口號，堅決地將其作為政綱之一列入國民黨「一大」宣言之中。與此同時，他還勇敢地轉入了採取進行鬥爭的實際行動，並以此為中心組織和發動千百萬人民群眾掀起了廣泛的「廢約」運動的高潮。

在實際行動中，孫中山先是積極地參加了反對「二十一條」的鬥爭，他在一九二〇年八月的一次談話中說：「我已經看出了如何能夠停止中國現在的混亂。這個問題的關鍵，就是廢除

43 《民國日報》，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增刊。

44 《孫中山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五百二十五頁。

二十一條款。」並堅定表示：「我們革命黨，一定要打到一個人也不剩，或者『二十一條款』廢除了，才歇手」；⁴⁵之後，他又多次深入人民群眾之中，號召群眾參加「廢約」的鬥爭。孫中山號召工人組成一個「大團體」，「和外國交涉，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⁴⁶號召學生「我們要以後不做各國人的奴隸，要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並強調：「這就是做人的、做學生和做一般國民的，對民族主義應該有的責任。」⁴⁷而一九二三年冬的「關餘事件」，則是孫中山「廢約」鬥爭實踐方面的一件最為突出的事例。當時，帝國主義國家不僅不承認廣東政府，而且也不容許它留用西南各省應得的「關餘」。孫中山面對北京外交使團揚言將以強硬手段對付，甚至還派出二十餘艘外國軍艦集結廣州威脅恫嚇而毫不動搖，他針鋒相對的宣告：「中國海關始終為中國國家機關，本政府轄境內各海關，自應遵守本政府命令」；所採取截留關餘的行動，「乃完全中國內政問題，無與列強之事」。⁴⁸由於孫中山毅然給予堅決回擊，以及全國人民的合力抗爭，終於使外交使團被迫作出將海關關餘撥給廣東政府的決定，打擊了美、英、法、意、日、葡等帝國主義的反動氣焰。鬥爭實踐進而促使孫中山懂得了只有堅決進行「廢約」鬥爭，才可能「除去」帝國主義橫加給中國人民的「賣身契」，清算歷史的舊賬，挽救中國的危亡。

45 《孫中山全集》第五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版，第二百零九十六—三百頁。

46 《孫中山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八百四十、八百三十五頁。

47 《孫中山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八百九十一—八百九十二頁。

48 胡漢民編：《總理全集》第二集，上海民智書局一九三〇年版，第三十七頁。

孫中山為著完成自己的「廢約」夙願，進行了艱苦不懈的鬥爭，堪稱殫精竭慮，鞠躬盡瘁；直到他生命彌留之際，還特別將其作為政治遺訓，語重心長地囑告國人：對於「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⁴⁹

怎樣認識孫中山的「廢約」思想與實踐的作用，它對當時及後來的影響如何？

過去，在一段時期中，我們對於孫中山思想的科學性和實踐的先進性，欠缺了恰如其分的評價，以致未能充分認識到它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孫中山與「廢約」之事同樣存在著這個問題。實事求是的考察，斯事的主要作用和影響是清楚的：

首先，孫中山的「廢約」思想和實踐，超過了他的前人和同時代人。在舊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早期改良派，對於不平等條約的認識往往都停留在感性階段，所作的批判缺乏理論高度，較為膚淺或存有謬誤。如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韜曾將領事裁判權說成是「時勢所逼，未嘗不可」。⁵⁰何啟等則稱讚英人把持控制下的中國海關「頗有成效」，「無可疵議」，甚至還說「未有洋人，虛耗實多；既用洋人，虛耗則少」。⁵¹維新派梁啟超曾提出：願「將全國之地盡為通商口岸」，「即與各國訂約通商」，並「保持西人洋行教堂」，⁵²等等。並且，他們對於不平等條約，

49 《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第六百四十頁。

50 王韜：《韜園文錄外編》。

51 何啟、胡禮垣：《曾論書後》。

52 丁文江等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第一百二十四頁。

企圖以和平方式或寄希望於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來解決問題，對「廢約」之事並無高明對策，很少甚至沒有採取過任何「廢約」的具體行動。就是孫中山同時代的某些人，如鄧澤如、胡漢民等，也竟提出收回租界、海關和「廢約」等內容，不要「太明顯的提出來」，不列入國民黨的政綱，免得影響國民黨自身的地位。⁵³而孫中山的「廢約」主張和態度，則是大大高明於早期改良派和他同時代的民主革命派人物，達到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反對不平等條約的最高水準。

其次，孫中山的「廢約」思想與實踐，經過曲折演進臻於完整成熟，不僅留給了後人一份值得繼承的珍貴遺產，而且它揭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階段「廢約」鬥爭的第一頁，是新民主主義時期「廢約」鬥爭的開端，並對當時和以後的中國人民的「廢約」反帝鬥爭有著很大的影響。

孫中山晚年對「廢約」的主張和行動，益發堅定和勇敢，他果決地拋棄了對帝國主義的幻想，改變了以往的軟弱態度，敢於和西方列強進行面對面的堅決鬥爭。他明確提出要盡一切力量收回租界、海關和領事裁判權，廢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條約，「中國人民早已不能忍耐外國僑民在中國領土上飛揚跋扈」。⁵⁴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他在《北上宣言》中鄭重宣佈，召集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是自己到北京去的主要任務。這一主張，表達了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因而得到包括中共黨人在內的全國各階層人民的熱烈歡迎和響應。正是在他的號召之

53 黃季陸：《劃時代的民國十三年》，載香港《掌故》，第四十一—四十二期。

54 廣州《民國日報》，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下，一場轟轟烈烈的「廢約」運動在全國範圍內迅速掀起。以後，又在此基礎上，開始了以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反對並阻撓「廢約」為目的的北伐戰爭。

孫中山的「廢約」思想與實踐，為中國人民艱辛的「廢約」鬥爭開了一個好頭，提供了經驗及教訓的警策和啟迪，並促進和推動了以後的「廢約」鬥爭的發展。近代中國的「廢約」鬥爭，經歷著一個艱難坎坷且又長期、漸進的過程，是隨中國人民和國家力量的愈益強大而逐步完成的。在孫中山辭世後的長達八十餘年的時間裡，他的「廢約」的「未竟之業」，在中華民國時期，不論一直以孫中山繼承者自居的南京國民政府，還是具有更大妥協性的北京政府，都對「廢約」工作進行過不斷努力，逐漸收回了一些喪失的國家主權；之後，是孫中山事業名副其實的繼承者、以堅決反帝而著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擔當起了徹底掃除近代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歷史重任。一九九七年和一九九九年，香港、澳門的相繼回歸，標誌著畢其全功，圓滿地實現了長期以來幾代中國人收回領土、掙脫全部枷鎖的共同願望，洗雪掉百年國恥，最終圓了國家民族統一的跨世紀的美夢。